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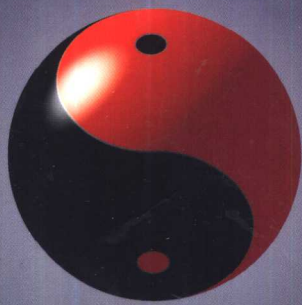
天
丛
地
书
人

张子正蒙

【宋】张载 撰

【清】王夫之 注

汤勤福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天
从
地
书
人

张子正蒙

【宋】张载 撰

【清】王夫之 注

汤勤福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子正蒙 / [宋]张载撰; [清]王夫之注; 汤勤福导读.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2

(天地人丛书)

ISBN 7-5325-2804-9

I. 张...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正蒙 - 注释
②张载 - 哲学 - 研究 IV. B2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074 号

天地人丛书

张子正蒙

[宋]张载撰

[清]王夫之注

汤勤福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75 插页 5 字数 149,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5325-2804-9

B·319 定价: 10.80 元

出版说明

儒家自孔子开派以来，留意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礼乐刑政之术，其间虽有仁义中和之谈，但大抵不越乎日常道德之际。汉唐诸儒治经，大多着重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罕及本体。及至宋儒，始进而讨论原理，求垂教之本原于心性，求心性之本原于宇宙。故原始儒学的特色是实践的、情意的、社会的、人伦的，而源于宋，延及明清的儒学(即理学)的特色则是玄想的、理智的、个人的、本体的。

北宋周敦颐作太极图，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奠定了理学的基础。此后理学昌盛，大致可分三大系统：二程(程颢、程颐)、朱熹一系强调“理”，陆九渊(象山)、王守仁(阳明)一系注重“心”，张载、王夫之(船山)一系着眼“气”。清初的颜元(习斋)初尊陆王，转宗程朱，最终回归原始儒学，以“实文，实行，实本，实用”为治学宗旨。

《天地人丛书》选取宋明及清初诸位大儒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凡8部，为《周子通书》(以清道光二十六

年何绍基刻《宋元学案》本为底本)、《张子正蒙》(以清同治四年金陵刻《船山遗书》本为底本)、《二程遗书》(以清同治十年涂宗瀛刻《二程全书》本为底本)、《朱子近思录》(以明嘉靖吴邦模刻本为底本)、《象山语录》(以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嘉靖刻《象山先生全集》本为底本)、《阳明传习录》(以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本为底本)、《船山思问录》(以民国二十二年上海太平洋书店排印《船山遗书》本为底本)、《习斋四存编》(以民国十二年四存学会排印《颜李丛书》本为底本)。每部书前冠以专家导读,勾勒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奥妙,探索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以期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一代宗师的学术个性;同时,整套丛书亦勾画出儒学前后发展的主线:是问津宋以后儒学演进、下探当代新儒学源流必读的入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4月18日

2000/04/18

目 录

张子正蒙导读	汤勤福 1
张子正蒙	77
王夫之序论	79
宋史张子本传	83
卷一	85
太和篇	85
参两篇	99
卷二	109
天道篇	109
神化篇	114
卷三	125
动物篇	125
诚明篇	129
卷四	143
大心篇	143

中正篇	149
卷五	165
至当篇	165
作者篇	176
卷六	181
三十篇	181
有德篇	188
卷七	195
有司篇	195
大易篇	197
卷八	215
乐器篇	215
王禘篇	222
卷九	229
乾称篇上	229
乾称篇下	233

张子正蒙导读

汤勤福

一、张载生平及其著述

张载字子厚,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主要活动于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张载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其父张迪为仁宗朝殿中丞,后知涪州(今四川涪陵),卒于任所。时张载与弟张戢年幼,家境不富,无力将其父安葬故乡。其后,张载与弟戢侨居于今关中眉县横渠镇。当时关中属边地,与西夏相邻,常有战事发生,因此张载曾向邠人焦寅学过兵法。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被贬职为陕西招讨使,镇守延州,张载上《边议》九条,力陈择帅、择守、讲实、足用、省戍、清野、固守、因民、警败等事,甚为详尽。范仲淹见张载在学术上可能有发展,便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劝张载认真阅读《中庸》。于是张载就开始对儒学进行研读。此时,张载实际上还研读过大量佛老之书,“累年尽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38岁的张载登进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参军,后迁丹州云岩县令、著作佐郎、

筓书渭州军事判官等小官。在这些职任上,张载也比较注意关心民间疾苦,重视改变社会风俗,树立尊老事长的优良习尚。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冬,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张载被召入对,以渐复三代礼乐为对,受到神宗赏识,于是授崇文院校书。熙宁三年,神宗曾问其治国方略,他曾明确提出要行井田、复三代,实际上也是对当时政局不满而强调应该变法图强,与正在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在政治趋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在变法的具体措施上两人则有很大不同。但是,张载与旧党人士二程、司马光等人或有亲属渊源,或有地域关系,因此他与旧党也不可能脱离关系,在一些思想观点上与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肯定会产生“语意不合”,加之“累章论王安石乱法”(《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的弟弟张戢被贬黜为知公安县,于是,张载“益不自安”,便“谒告西归,居于横渠故居”。之后的七八年间,张载在横渠镇收徒讲学,研究儒学,创立了以重“礼”(礼乐)为特色的理学派别——关学。熙宁十年春,张载再次应召入朝,任同知太常礼院,但他与礼院长官意见不合,再次以疾为名辞职西归。途中,至临潼病情突变,“殁于骊山之下”,享年 58 岁。

张载一生著述颇丰,据宋人朱熹《近思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后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魏了翁《为周二程张四先生请谥奏》等所著录的记载及后人所编纂者来分析,张载有《文集》、《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春秋说》、《信闻记》、《崇文集》、《语录》、《祭礼》、《西铭》、《东铭》、《经学礼

窟》、《正蒙》等。现存张载著作有《西铭》、《东铭》、《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和《文集》(现编入《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另有明人吕柟所纂《张子抄释》等，这些均是研究张载思想的主要资料。

过去，学者们根据张载弟子吕大临(后师从二程)所作的《横渠先生行状》，认为张载的学问源自二程，现在已经被彻底否定了。^①事实上，张载“躬行礼教”的理学思想，与二程的思想确实有较大差异。

二、《正蒙》概说

《正蒙》是张载长期思考而撰成的著作，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及苏昞、范育《正蒙序》(苏、范两人均为张载弟子)记载：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张载“谒告西归，居于横渠故居”，此后便“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此便是指张载苦思力索，撰著《正蒙》之事。至熙宁九年秋，张载因“感异梦”，觉得自己或许有不测，于是“忽以书属门人，乃集所立言”，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

^① 在南宋时，朱熹曾根据程颐之语，否定了张载之学来源于二程，但后人仍有持张载之学来源二程的观点；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姜国柱《张载的哲学思想》等书都对此作过考证，可参见。

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张载集》附录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此后出于《张载集》者只列篇名。）

但是，张载出示的仅是自己平时札记性质的书稿，并无完整的系统与分类^①，于是，苏昞提出将此书稿分门别类，以便流传。在得到张载同意之后，苏昞“辄就其编，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大约在整理之初，是征求过张载意见的。熙宁十年（1077年），张载再次应诏至京师，范育“即受其书而质问”过张载，大约这部札记性质的书稿在张载弟子之中小范围地流传着。同年秋，张载在归途中去世，苏昞、范育诸人“遂出其书”，“传者浸广”。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苏昞将他最后编定的《正蒙》出示同门友人范育，并请其为之作“序”。正值范育“居太夫人忧”，并未立即撰序。三年之后，范育才写成《正蒙序》。自此，苏昞编定的《正蒙》与范育的“序”便一同流传。这就是《正蒙》成书过程。显然，《正蒙》并非张载生前亲手编定的一部完整著作，而是其弟子苏昞在张载去世之后编成的。

由苏昞编定的《正蒙》，系统性较强，但是作为《正蒙》末篇的《乾称篇》，则是张载早已公开的《西铭》（又名《订顽》）与《东铭》（又名《砭愚》）两文的合篇，以此推断，张载

^① 《正蒙》中有许多条资料出于《横渠易说》、《经学理窟》之中，显然，《正蒙》有相当部分内容是从以往所撰的那些有价值的部分分别采录下来的。此可参见《张载集》校勘记。

传给苏昞的《正蒙》札记稿大约不包括《乾称篇》的，它是苏昞加入的。

从《正蒙》来看，可以说是张载哲学思想的最终归结，可以代表其一生最典型的思想，因此一直受到张载之后的学者们的重视。不但理学家们重视它，其他学者也重视它。现在研究张载思想的学者专家同样对此十分注重。

现存《正蒙》的 17 篇均有篇名，大致说来，每篇各有研讨的侧重点。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将《正蒙》分为 18 篇，即《乾称篇》分为上下两篇（即仍将《西铭》与《东铭》分开），并在绝大部分的篇目前撰写了“解题”，少则二三十字，多则如《乾称篇上》达千余字（超出《西铭》5 倍之多），其次《诚明篇》亦近 400 字，可以参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的“解题”往往超出张载篇中所论，实际上是阐发自己的看法，因此，研究张载思想不可以王夫之的“解题”作根据（作参考自然是应该的），而应认真审读张载各篇原文本身含义。

《正蒙》书名来自《周易·蒙卦》“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吉，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张载解释道：“礼闻取道义于人，不闻取其人之身。来之为言，属有道义者谓之来。来学者，就道义而学之，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显然，张载认为“来学者”是依据礼来求“道义”，而教之者亦应该依据礼教之以“道义”，显示了张载教人重“礼”的特色。在解释《彖》“‘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

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一段时，张载说道：“时中之义甚大，如‘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者，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时中，故蒙所以得亨也；蒙无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时中之亨也。蒙卦之义，主之者全在九二，《象》之所论，皆二之义。教者但观蒙者时之所及则道之，此是以亨行时中也；此时也，正所谓如时雨化之。如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则是教者之过；当时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则是教者之功。‘蒙以养正，圣功也’，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张载集·横渠易说》）显然，张载以《正蒙》定其书名，实际是自称是依据“礼”来教童蒙以“道义”，以为这是继圣人之功，自然也就有继道统自居的含义（详最后“道统”部分）。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称：“谓之《正蒙》者，养蒙以圣功之正也。圣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达者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洙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绳墨也，射者之彀率也，虽力之未逮，养之未熟，见为登天之难不可企及，而志于是则可至焉，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养蒙以是为圣功之所自定，而邪说之淫蛊不足以乱之矣，故曰《正蒙》也。”王夫之仅指出张载撰写《正蒙》是为了“养蒙以圣功之正”，实际上未看到张载自以继圣人道统这一点。关于张载继道统问题，下面将有专门论述。

张载《正蒙》自从苏昞整理完成后,后人对其注释者不少,如宋人朱熹曾注《正蒙》及《西铭》;明清注释者更多,如王夫之有《张子正蒙注》、王植著有《正蒙初义》、刘玘有《正蒙会稿》、高攀龙集注、徐必达发明的《正蒙释》、李文炤《正蒙集解》、李光地有《注解正蒙》、杨方达有《正蒙集说》、李元春撰《张子释要》等。其中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在阐述张载《正蒙》思想的同时,也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学术价值颇高。

张载《正蒙》的首篇是《太和篇》,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天人万物、阴阳动静之理,实即讨论了“道之所出,物之所自生,性之所自受”(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之理,即“天道”。

《参两篇》从一物两体入手讨论天地演化之理,以为天地日月五行,本于一而通极于万变,以推出万物一源;能见者是已生成的天地日月五行的有形之“象”,不可见者乃是天地日月万物之源——是“道”(天道)、是“易”、是“理”。

《天道篇》“因天道推出圣德,而见圣人之学”(《张子正蒙注》)。圣人有“天德”而具“天地之道”,因此“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天道篇》以下凡出于所论之篇均不注出处)。

《神化篇》以天德为神、天道为化;存神顺化可致天德良能。因此,圣人存神顺化乃至德盛仁熟,可闻“性与天道”而制礼乐。张载强调“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长”,只有“存虚明,久致德;顺变化,达时中”,如此才会达到

“仁之致，义之尽也”。此篇还批判异端之学（佛道两学）“销碍入空”，非是穷神知化之义。

《动物篇》“论人物生化之理，神气往来应感之几，以明天人相继之妙，形器相资之用”（《张子正蒙注》），实际上阐述了天人、天物合一的理论，此篇还讨论了梦寐与现实关系。

《诚明篇》提出的“诚”这一概念，是《正蒙》继承《中庸》思想而讨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张载强调“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是穷理尽性的最终目的，也是理学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本篇从“人”的角度阐发了穷理尽性的重要意义，以为“顺性命之理，则得性命之正”是学者应该遵循之道，反对“灭理穷欲”，“以嗜欲累其心”。

《大心篇》从学者穷理尽性以明天道入手，强调圣人尽性，不以“闻见之知”禁梏其心，批评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不知穷理尽性而以“六根”因缘天地，以未缘本，是为“幻妄”。

《中正篇》在《大心篇》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学者穷理尽性工夫，讨论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中的重要概念，如中、中道、中正、中庸、时中、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率性之谓道等等；提出“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以达到超凡入圣之程度。

《至当篇》在上述两篇的基础上，提出“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而得天下之理应该懂得“易简之理”，因为“易简之善配至